

明清时期中国药业对外交流与贸易

——以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国为考察对象

王洪伟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医药交流是双向的,既有中国向其他国家的医药输出,也有其他国家对中国医药输入,交流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并有逐步加强之势。中国地大物博,所产药材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再加上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外医药交流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对这些国家大量输出药材、医药技术及文化,进口则以其所短缺的药材为主,也有少量的国外医药书籍传入中国。对中国来说,各国药材的输入充实了中国的医药宝库;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药物、医药文化以及医学人才的不断输入,极大地提高了其医药发展水平,有利于当地民众的疾病防治和身体健康。同时要指出的是,由于受海禁政策的影响,明清时期中外医药贸易和交流也受到了一定制约。

【关键词】明清时期;中国药业;对外交流与贸易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5-0079-07

Foreign Exchange and Trad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king Kore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 Objects of Study

WANG Hong-wei

(Institut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ina's medical exchanges with Kore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two-way, with both China's medical exports to other countries and China's medical impo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abundant resources, a large variet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a lo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occupies a leading position in sino-foreign medical exchanges. China exports a large number of medicinal materials, medical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o these countries, while imports are mainly medicinal materials in short supply, and a small number of foreign medical books a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For China, the import of medicinal material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has enriched the treasure house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e continuous import of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culture and medical talents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ir medical development level,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and health of local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ea ban policy, the medical trade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also restricted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ina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foreign exchange and trade

自古以来,开展医药的对外交流与贸易,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时期的对外政

[收稿日期] 2019-08-16

[作者简介] 王洪伟(1975-),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科技史。

策方面,严禁与弛禁交替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药业的对外贸易与交流进入新的阶段。由于明清时期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获得极大发展,使得商船承载的货物多、流量大,而陆上丝绸之路自唐以来便长期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在明清药业开展的对外贸易中,海路贸易占居主要地位。其中海路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民间贸易中包括合法贸易和走私贸易两个方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明清时期的海路贸易为重点考察对象,借以分析药业的对外交流和贸易问题。

一、中朝间的医药交流与贸易

自古以来,朝鲜就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作为重要藩属国,朝鲜与明清两朝的联系非常密切,在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互通有无的局面,医药方面的交流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中国对朝鲜药材及医药书籍的输入

朝鲜开始对明朝定期朝贡始于洪武二年(1369),史载:“(高丽)遣总部尚书成准得如京师贺圣节,大将军金甲雨贺皇太子千秋节,工部尚书张子温贺正”^①。从此,两国使臣频繁往来。由于关系密切,成祖朱棣特允许朝鲜一年三次如贡,成为朝贡次数最多、在所有朝贡国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的277年中,朝鲜使臣出使中国共计1252次,平均每年出使4.6次。^②其中,以永乐至宣德年间最为集中,据统计,永乐年间(1403-1424),朝鲜朝贡91次;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朝鲜朝贡67次,平均每年达6次之多。^③朝鲜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始于1637年“丁丑约条”的签订,清政府对朝鲜予以特别优待,使得两国间的交流特别频繁。1637-1850年间,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使者团有160余次,接待朝鲜使节团615次。以下对中朝两国交往过程中医药的相互输入过程予以阐述。

(1) 朝鲜药材输往中国 朝鲜国向中国进贡的特产有硫磺、苏木、胡椒、白礞、川椒、干姜等,人参是其中的大宗。永乐十九年(1421),“(李朝)进贺使通事仇敬夫自平壤来,启曰:‘进献人参百斤不敷。上令礼曹择济用监人参百斤以充之。’”^④宣德五年(1430),李朝规定每年向明进贡物品之品种和数量中,人参是其中的重点,“礼曹议:‘每年正朝、节日、千秋进献方物,金银代用物件以启。正朝:帝所……人参五十斤……东宫……人参二十斤……今加……人参二十斤。节日:帝所……人参五十斤……千秋:……人参二十斤……今加……人参二十斤。’从之”^⑤。自明朝起,朝鲜使团进京后会在规定的地方开市,与市民和商人进行“八包”贸易^⑥。康熙二年(1663),清廷废除八包进口限制,放宽朝贡数量,推动朝鲜人参大量输入中国,规模逐渐增长。1797-1840年间,朝鲜输入我国的人参数额达96090斤^⑦,可见朝鲜输往中国的人参数量十分巨大。庞大的人参出口额推动了朝鲜人参种植业的发展,1844年,清人柏葭出使朝鲜时,看到朝鲜参田“弥望皆是”^⑧。

(2) 朝鲜医药书籍传入中国 在吸收中国医学成果的基础上,朝鲜的民族医药获得极大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医药理论成果,并能吸引清人通过各种途径向朝鲜求取医药书籍。1721年和1738年,赴朝清使先后两次向李朝求取《东医宝鉴》,朝鲜国王特予赠送,之后清朝廷对这一医著十分重视,多次翻刻出版。此外,通过民间购买等渠道,朝鲜医药名著《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济众新编》《东医寿

① 金渭显编著:《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食货出版社,1983年,第776页。

② 高艳林:《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

③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5-76页。

④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342页。

⑤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353页。

⑥ 朝鲜使节进贡时,每人携带一定数量的人参,分为8个包包装,可在沿途售卖所得利润充当旅费。

⑦ 依据《朝鲜李朝实录》《清实录》等资料统计。

⑧ 柏葭:《奉使朝鲜驿程记》。

世保元》《四象新编》等也相继传入中国并得到刊印,丰富了中国的中医药宝藏。

(二) 中国对朝鲜的药材与医药科技输出

(1) 朝鲜国王委任使者在中国购买药材,或请求明政府赐予药材 永乐元年(1403)的朝贡中,李朝贡使请明朝准予购买龙脑、沉香、苏合、香油等物,明成祖慨然赠药:“计赐药一十八味,共八十二斤八两。”^① 正统三年(1438),李朝使节请求明朝赠送蝎、麻黄、甘草之种、苗,获准携带回国。弘治八年(1495),李朝国王燕山君患病,令医官赴明求药,明政府赐予雄黄解毒散、善应膏。总之,在朝鲜国政府的鼓励下,使臣、医员、商人在中国广泛采购各类中药材。据冯正玉统计,清朝输往朝鲜的中药材种类多达117种^②。由于朝鲜药草资源极为短缺,所以输入的药材数额自然也很庞大,以致“驮载转输,驿路残弊”^③。

(2) 朝鲜医官积极整理中国医书,学习先进的医药技术 永乐十五年(1417),李朝王廷派遣医师庾顺道赴中国学习医术,回国时携带中国医书,并在朝鲜国内刊刻,促进中国医药文化的传播;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家来中国学习药材鉴别法,他归国后完成对朝鲜28种药物的鉴定;宣德八年(1433),朝鲜医官在参考中国医书的基础上,编撰成《乡药集成方》,堪称朝鲜民族传统医学的奠基之作;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内医院教习御医崔顺立等人赴明,特地就朝鲜医事上的一些疑问向明朝太医院请教。清乾隆年间,朝鲜使者朴斋家将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带回国内,在朝鲜进行试验并获得成功;之后后朝鲜医家丁茶山结合中国医著《医宗金鉴》,编写成《种痘心法要旨》。此外,朝鲜使臣、留学生还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西医汉译本,如《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论》《妇婴新说》《博物新编》。中国以及西方医药技术传入朝鲜,极大地促进了朝鲜民族医药学的发展。

(3) 为维持与朝鲜国间的宗藩关系,皇帝主动向朝鲜赠送药材、医药书籍以示友好 洪武年间,明太祖赠送高丽国王的礼物中,有药材犀角、象牙、龙脑香、麝香、沉香、白花蛇等物;建文三年(1401),朝廷赠与的药材中有“木香二十斤,丁香三十斤,乳香一十斤,辰砂五斤”^④。永乐四年(1406)12月,向李朝国王赠送“片脑、沉香等十八味”^⑤;弘熙元年(1425),朝鲜使臣带回钦赐的龙脑、苏合油、朱砂、麝香、附子、芦荟等药材^⑥。李朝景宗王体弱多病,康熙帝多次派遣太医为其治病,并向朝鲜使臣赠送《医学正传》《万病回春》《医学入门》等书籍,对推动朝鲜医药水平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日间的医药交流与贸易

中日间的医药交流始于南北朝时期,吴(今苏州)人知聪携带大批医药书籍东渡日本,堪称中医学在日本传播的滥觞。明朝建立后,中日间的往来屡屡不绝,医药交流更是迈上新的台阶。清代中国医药文化继续东传,对日本医学产生深刻影响;同时,日本的一些特产药材也进入中国。

(一) 中国对日本药材的输入

明初,东南沿海倭患严重,明太祖对日实行朝贡与海禁相结合的贸易政策。从洪武四年至十三年,日本曾向明廷朝贡达七次之多。受日本国内政局混乱的影响和胡惟庸案的牵连,明朝断绝与日本的邦交往来,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明成祖继位后,恢复昔日的政策,使日本回到正常的勘合贸易轨道上

① 《李朝太宗实录》三年条。

② 冯正玉:《17-19世纪朝鲜对清贸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8页。

③ 《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36,六年二月。

④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61页。

⑤ 《李朝太宗实录》六年条。

⑥ 《李朝世宗实录》卷30,七年十一月。

来。鉴于日本朝廷态度的反复无常,明朝继任的皇帝对日贸易基本态度是实行海禁,只不过各自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时紧时松。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使来贡时向明廷要求更换嘉靖朝的新勘合,被明廷以日方未将弘治、正德的旧勘合悉数上交为由而拒绝。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两国外交关系断绝。即使在“隆庆开放”期间,赴日贸易也依然被禁止。在宽松的海禁政策期间,中日官方的商品往来很有限;厉行海禁期间,大批日本走私商船追随朝贡使船来到中国,与中国走私商人贸易,特别是朝贡贸易断绝后,民间走私贸易走向高潮,甚至取代官方贸易,成为中日贸易方式的主角。^①

明朝中日之间的药材贸易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永乐条约时期,即1404—1410年,这期间日本派勘合贸易6次,共38艘船只。第二期宣德条约时期,即1432—1547年,日本派勘合贸易11次,共50艘船只。日本向中国朝贡的主要是漆器、折扇、刀剑等工艺品和武器,药材种类则相对较少,以硫磺、苏木、胡椒、黄连为主。比如,景泰年间,日本勘合船一次带来硫磺36万多斤,苏木近11万斤。在勘合贸易过程中,贡使和附载的行商常常趁朝贡之机运载大批货物前来贸易,与民众进行互市,数额十分庞大。例如,1451年的勘合船上有日本商贾数百人,货物有硫磺三十九万七千五百斤,铜十五万四千五百斤,簣磺十万六千斤^②;1433年,勘合船上搭附硫磺2.2万斤,苏木1.06万斤。

清代中日之间的药业交流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清初,为孤立和打击郑氏海上力量,政府陆续出台海禁政策,颁布迁海令,停止中日间的官方贸易,并严厉打击走私贸易。康熙帝在位期间,鉴于海防形势的缓和,在开放海禁的同时,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及其相关事务,又建立行商制度,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发展。雍正时,创立商总制度,商总负责统领各行商对外贸易,并对外商进行管理,加强了政府对中日贸易的监管,为之后的清代诸帝所沿用。

值得提及的是,东洋人参清代进入中国,后迅速占领市场。《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东洋参出日本东倭地……此参近日颇行。无力之家,以之代辽参用亦有效。每枝皆重一钱许,亦有二三钱者。总以枝根印有日本二字名,价八换,无字价五换……今苏州有东洋参店,专市此参者。”^③由于东洋参售价偏低,因此深受国人喜欢,在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竞争力。

(二) 中国对日本的医药文化输出

(1) 中国对日本的药物输出 日本对中国商品有着巨大的需求,药物、日用品等均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每年对日本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庞大,仅从室町幕府末到德川幕府初期,从中国输入日本的各类货物达五、六百种,在这些货物中“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瓷,最急者,无如药”。^④明政府对日实行海禁政策后,刺激了民间的走私贸易。尤其是日本地方封建领主对中国商人给予优厚待遇,吸引了大批到日本经商的中国人,日本丰后、肥前平户及萨摩等地方最为集中,中日商船往来不绝。《罗山文集》中记载:“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舶,每岁渡长崎,自此逐年多多。”^⑤另外,德川幕府还给予华商各种优惠和安全保护,极尽所能地招徕中国走私商人。1639年日本锁国第一年3月到9月之间,就有93艘明朝商船运载货物到达长崎;1641年则达到97艘的空前数目。^⑥

据文献记载,日本输自中国的药材有:绿青、明矾、绿矾、芡实、槟榔子、檀香、芍药、黄精、何首乌、白术、石斛、甘草、海螵蛸、紫金锭、蜡药、黄精、红花、木犀、附子、天门冬、茴香、龙脑、麝香、眼茄、土茯苓、蚰蛇胆、蜡药、红豆、槟榔、樟脑、丹桂、南率、珍澡、土龄、茴香、蛾蛇胆、降真香、肉桂、犀角、川号、生墙、当归等。以川芎和甘草最为珍贵,“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此其至难至贵者也。其次,则甘草每百

① 关于走私贸易的文献记载较少,以下行文论述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对象。

②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4页。

③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458页。

④ 郭学礼:《明朝中日走私贸易关系探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⑤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6页。

⑥ [日]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7年,第18页。

金二十斤以为常”^①。大黄是清朝严格管控的药品。乾隆时期,福州将军魁伦等奏:“查大黄一种,遵旨严禁出洋,惟琉球岁勤贡献,恪守藩封,前经奏明,移咨该国王,酌计每年准买三五百斤之数。”^②据学者统计,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初,中国药材输入日本的数量在很多年份均超过100万斤,1812年左右创下了284.9万斤的记录。19世纪20年代后,总体贸易量虽不如前,却也依旧保持在每年50~100万斤左右。^③其中,通过走私贸易输入日本的药材量非常可观。《荷兰长崎商馆日记》记载,郑成功商队经常出入日本长崎港,每次运去的货物中几乎都有药材;大陆商人到日本贸易,往往也都参与药材买卖。

(2)日籍留学生通过在中国留学考察,将中国医药技术带回日本,推动日本医药水平的提高。日本僧医有邻在辑录中国百余部医药著作的内容后,编成《福田方》,成为日本医家整理、研究中医药学术的代表。1370年日本医生竹田昌庆来到中国,向道士金翁学习中医和针灸术,并从中国带走一批中医药典籍及针灸铜人图。田代三喜在华学医长达十二年,回国后倡导李杲、朱丹溪学说,在日本逐渐形成一个医学学派。日本名医阪净运于1492年到中国学习,学成后带回《伤寒杂病论》,大力宣扬张仲景学说。阿部将翁常年居留中国,攻读本草学术,擅长栽培、加工多种药材,精于药材真伪鉴别,在日本本草学界负有盛名。1607年,游学中国的林罗山将《本草纲目》送给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此后该书在日本广为流传,推动了日本本草学的发展。藤堂高猷从《福州府志》中摘录动植物名字,对可使用者加以整理,为日本的救荒事业做出了贡献。

(3)中国医家赴日行医,积极传播中医药文化。进入清代,随着中医在日本受到欢迎,大量的中国医家或受邀,或自愿前往日本行医谋生。朱子章、朱来章兄弟受幕府邀请赴日行医,治愈大量患者,受到日本医界的欢迎,甚至幕府医官也纷纷向其致书求教,他们还从国内带来《医宗必读》《本草备要》《药性赋》《本草纲目》等医书在日出售,传播了中国医术。王宁宇在江户开业行医,从之学医者颇多,培养了幕府医官森家之祖森有益等人,在日本影响较大。马寿安在大阪救死扶伤,结合临床经验,编写成《北山医案》《增广医方口诀集》《纂言方考评议》等著作,享誉江户中期的医学界。对日本医学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医家还有,戴笠、陈明德、陆文齐、吴载南、陈振先、周岐来、刘经光,以及僧人化外、心越、澄一等人,他们不仅将中国医药理论在日本发扬光大,也在日本传医授业,为日本培养了许多医药人才。

三、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医药交流与贸易

明朝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间的医药贸易以郑和下西洋期间最为显著。成祖时期,为宣扬国威,明政府频繁派出使臣出访海外各国,邀请他国使节入明朝贡。其中,在所有出访海外的使臣团队中,以郑和率领的团队规模最大、出访次数最多、航程最远。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七次奉命率船队下西洋,先后到达占城(越南中南部)、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旧港(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满刺加(马六甲)、苏门答刺、锡兰(斯里兰卡)、古里(印度卡利卡特)、渤泥(加里曼丹岛文莱)、爪哇、柯枝(印度科钦)、祖法儿(阿曼佐法儿地区)、小葛兰(印度奎隆)、溜山(马尔代夫)、吉兰丹(马来西亚东岸)、彭亨(马来西亚南岸)、刺散(红海东岸)等30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红海沿岸,前后历时28年,最终完成了这一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放开海禁政策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间的往来更是频繁,主要国家有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苏门答腊(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满刺加(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彭亨、柔佛。在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来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医药贸易与医药文

①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4。

② 《清高宗实录》卷1351。

③ [日]永积洋子:《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创文社,1982年,第112页。

化交流。

(一) 中国对东南亚药材的输入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中国、东南亚、西亚间的远洋航路网络,扩大了明代对外贸易区域,进而促成规模庞大的海外药材贸易。为向受访国表示诚意,郑和使团出访之时携带了种类繁多的中国货物。这些货物中,除瓷器、丝绸、茶叶之外,还有大量药材,如大黄、麝香、肉桂、樟脑、人参、茯苓、生姜、川芎、土茯苓、当归、鹿茸、水银等。^①郑和船队每到一处便将所带货物赐予番国君王,并在码头、市镇与当地人民进行平等贸易,换回海外土特产。《瀛涯胜览》记载:“中国宝船到彼(祖法儿国),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 (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 (柯枝国)“第三等人名哲地,系有钱财主,专一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②,反映出郑和与所到国家药材交易的状况。郑和使团通过贸易的方式从东南亚采购特产,后由船队归航带回,史载:“明月之珠,鸦鹛之石,沉南龙涎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类,皆充舶而归。”^③东南亚、西亚地区盛产香药,因此,郑和船队返航满载的特产药材中,香药应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学者依据马欢《瀛涯胜览》、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张燮《东西洋考》等资料,整理出郑和船队购回的香药种类有 27 余种。^④

郑和下西洋提高明王朝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促进中外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由于郑和推行和平的外交方针,使团所到之地,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贡,附随宝舟赴京朝贡”^⑤。在出访过程中,一些医生随船队到了海外,最终留在他国行医,无形中成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使者。

郑和下西洋,使得所到国家和地区了解明朝国势的强盛,纷纷遣使回访,定期朝贡。在这些国家中,泰国、越南、菲律宾等是药材进贡量最大的国家。西洋、古里、锡兰山、阿丹、刺撒、柯枝、加异勒、南勃利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以致“诸番使臣充斥于廷”^⑥。泰国进贡的药材主要有:象牙、珊瑚、犀角、没药、藤竭、藤黄、肉豆蔻、胡椒、大枫子、荜拔、白豆蔻等。^⑦越南进献的贡品主要有:象牙、犀牛角、犀、孔雀尾、龙脑、奇楠香、檀香、乌木、苏木等。爪哇国从洪武元年(1368)到天启元年(1621)的 253 年中,向明朝廷进贡 68 次,贡物主要有胡椒、荜拔、阿魏、芦荟、没药、犀角、象牙、乌爹泥、龙脑、血竭、奇南香、乳香、白豆蔻、藤竭、大枫子、丁皮、闷虫药等。^⑧

清代,受商品经济的刺激,私人到东南亚开展海外贸易的现象更加频繁。大量的中国商人活跃在马六甲地区从事药材贩运,英国商人亚伯奎对当时的药材贸易给予高度赞扬:“所有的人仍然会到马六甲来,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世界上所能讲得出来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⑨通过朝贡和边民互市贸易,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药材输出种类和数量较明代有所增长。泰国输入中国的药材主要有龙涎香、檀香、沉香、燕窝、白胶香、降真香、樟脑、犀角、象牙、桂皮、荜拔、大枫子、通大海、乌木、苏木、儿茶皮、蔷薇露、砂仁、黑胡椒、豆蔻、槟榔、象牙、紫梗、穿山甲皮、蛇皮、鹿角、牛骨、水牛骨、象骨、犀牛骨、虎骨、鹿筋

① 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307页。

② [明]马欢:《瀛涯胜览》,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09页。

③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言,中华书局,1982年。

④ 严小青:《中国古代植物香料生产、利用与贸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明]陈诚:《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52页。

⑥ 《明史·外国传》。

⑦ 徐启恒:《两汉至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泰关系》,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⑧ 参考赵令阳:《明实录之东南亚史料》,学津出版社,1968年,第78页。

⑨ [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10页。

等。这些药材不仅种类丰富,数量也十分庞大。以19世纪20年代为例,泰国每年向中国输出60000担(旧制1担等于100斤)胡椒,16000担紫梗,30000担苏木,1000担象牙,500担小豆蔻。越南向中国出口的药材为砂仁、中皮、牛角、鳖甲、奇楠、犀角、肉桂、象牙、槟榔、鹿角、胡椒、象骨、黄蜡、水牛角、白锡、薯蓣、海参、丹砂、水银、燕窝、大茴、冰糖、鱼翅等。菲律宾输往中国的主要为黑海参、白海参、燕窝、黄蜡、珍珠、海藻、加龙安油、丁香树皮、肉桂、胡椒、土产樟脑、檀香木、玳瑁、蓝靛等。印度尼西亚的贡品有:胡椒、苏木、乌木、檀香、束香、沉香、奇楠、冰片、白藤、经文席、象牙、犀角、鹿筋、燕窝、海参、白糖、冰糖、椰、槟榔、铅、锡、珍珠、硫磺、鸦片、丁香等。^①这些药物在引进中国后,不但被吸纳到新的医方中,而且用于创制新的剂型。

(二)中国对东南亚的医药文化输出

(1)中国医药书籍传到东南亚,促进了当地本草学的研究。通过官方赠送、移民携带等多种方式,《医学入门》《景岳全集》《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名著在清代陆续传入东南亚,受到极高的评价和重视。各国医家对其加以研究,不但将中医药理论运用到现实中,而且对其进行创新,撰写本国医药书籍。越南“医圣”黎有卓刻苦钻研中医药理论,结合临床经验,所编写的《海上医宗心领全帙》一书,是越南第一部内容完备的医书。泰国医生在为病人治疗过程中,采用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治方法,在所用品上,中药占据约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在马来西亚,国家药典《马来亚医药书》中引用大量中草药,当时受到中国本草著作的影响。

(2)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中药店、行医看病。明清之际,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大量华人络绎不绝来到东南亚定居,从事医药等各个行业,他们将先进的医药技术带到侨居地,提高当地人的医疗水平,推动了药业的发展。在泰国,19世纪20年代,曼谷所有医药行业全部由中国人或交趾支那人从事或开办,中国医生所需要的中药材全部从中国进口。^②在马来西亚,广东人古石泉在檳城创办首家中药店仁爱堂,经营药业百年不衰。在新加坡,开元、成德记、同善、福安堂等都是生意兴旺的华人药材店。在印度尼西亚,医术精湛的中医享有极高的地位,还得到荷兰殖民者或者印尼土著人的信赖。吧城的华人医生周美爷便是其中之一,凡总督或高级官员有病时,都邀请其给予医治。中国医者、中药人员建立中药店、行医卖药,推动中国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发展,为当地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冯立军.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M].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
- [2] 唐廷猷. 中国药业史[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
- [3] 李云泉.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① 冯立军:《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② John Crawfo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London, 1828.